安徽地区史前彩陶的初步认识

张爱冰

【关 键 词】安徽;史前彩陶;橘地红彩;考古学文化系统

【作者简介】张爱冰,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合肥 230039)。

【原文出处】《考古》(京),2022.4.7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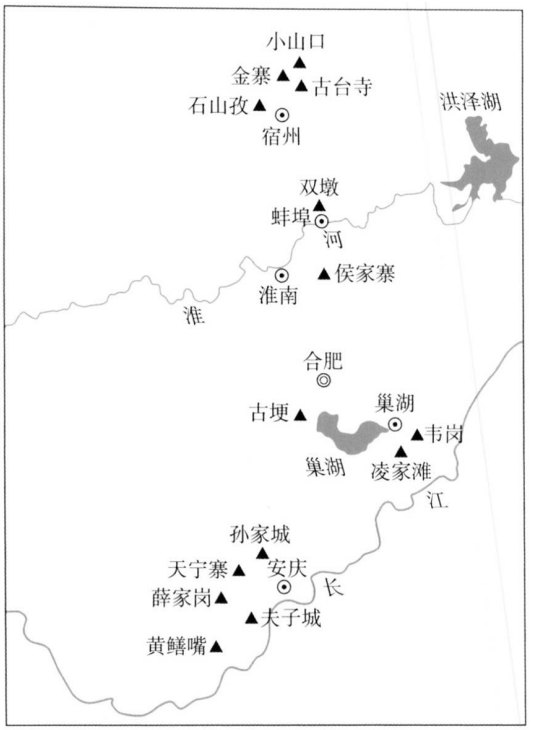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侯家寨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AKG001)的资助。

因淮河、长江两大河流横贯东西,安徽的自然地理自北向南可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皖南三个单元。历史上,这一地区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

安徽地区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寿县附近的考古调查[1],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并倡导开展“苏鲁豫皖考古课题”,田野考古才真正陆续展开。通过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安徽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渐清晰:淮河以北相继发展的小山口一期文化、石山孜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时期文化,江淮之间相继发展的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孙家城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皖南地区也有相当于马家浜、北阴阳营、崧泽和良渚文化阶段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

在安徽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有丰富的彩陶遗存。这些彩陶遗存主要发现于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重要遗址包括濉溪石山孜、蚌埠双墩、定远侯家寨、肥西古埂、含山韦岗、怀宁孙家城、潜山薛家岗和天宁寨、宿松黄鳝嘴、安庆夫子城、宿州小山口和古台寺、萧县金寨等。截至目前,完整或可修复器物近百件,陶片数量更多,其中侯家寨、孙家城遗址出土彩陶片均达百件以上。由于地处文化交汇地带,安徽境内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出土的彩陶既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又具有一定的融合性,因此,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范畴一并加以考察。为行文的便利,称为安徽彩陶或安徽史前彩陶(图一)。

安徽彩陶出土数量可观,内涵丰富、复杂,但多年来认识不足,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由于材料的限制,多为零星论及。杨立新最早认为古埂下层出土彩陶与北阴阳营类型下层、刘林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彩绘风格十分相近[2]。严文明认为侯家寨上层和古埂下层彩陶可与北阴阳营、大溪、大汶口文化的刘林



图一 安徽史前彩陶出土地点示意图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期和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相比较[3]。邹厚本、谷建祥认为古埂下层和侯家寨上层许多因素与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类型相同，同时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和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影响[4]。朔知将安徽史前绘彩陶器的发展分四期，年代距今7000-4000年[5]。2000年以后，随着孙家城、韦岗等遗址的发掘，双墩、石山孜等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尤其是侯家寨等遗址发掘资料的重新整理，使得安徽彩陶的材料得以极大地丰富。

如所周知，彩陶的发生、发展与传播，是世界史前文化发展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史前彩陶的版图中，安徽彩陶又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拟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参与整理侯家寨遗址发掘资料的一些心得体会，就安徽史前彩陶的年代、构成和源流，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安徽地区最早的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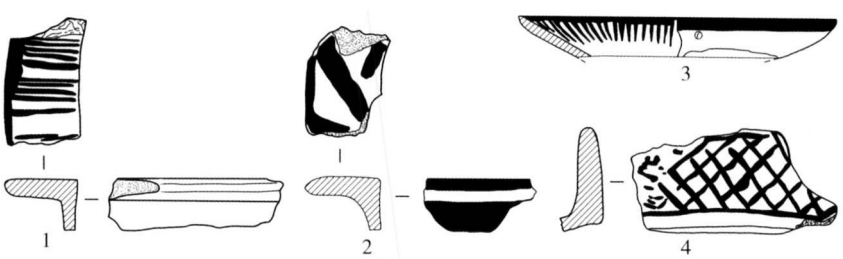
安徽地区最早的彩陶，发现于淮河流域的石山孜文化和双墩文化，代表性遗存见于石山孜二期、双墩和侯家寨一期文化。

石山孜遗址位于濉溪县石山孜村北部，古濉水南侧，1988、1992、1993年共进行了三次发掘[6]。在第二、三次发掘所获遗存中，第一期文化陶器以釜类器为大宗，在部分器类如釜、碗和钵上施红衣。第二期文化的陶器釜、鼎并重，开始有少量彩陶，以红彩为主，器形有盆和钵。盆多在宽平沿上饰交错条纹、平行条纹、菱格网纹、三角形图案、放射状纹图案和宽带纹等。钵多在口下饰一周宽带纹，其中有一件为内彩，器内沿下另饰一周带状纹，其下饰密集的放射状条纹(图二，1～4)。石山孜遗址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一期大致为距今7900-7200年，二期大致为距今7200-6300年。

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村北侧，南距淮河约5公里，1986、1991和1992年进行了三次发掘[7]。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器物特征，可将双墩遗址分两期四段。早期陶器以釜为主，与支架搭配使用，支架多为祖形。晚期陶器中釜、鼎共存，支架多为圆柱形。此外，在碗底等部位刻划各类符号，以及制作形态稳定的鹿角勾形器，也是双墩文化的显著特征。双墩早期前段发现有红衣陶盆和碗，后段开始在钵口下饰红彩宽带纹。晚期前段彩陶最为兴盛，器形有盆、钵和罐，均饰橘地红彩。盆多在口沿的沿面饰一周交叉线纹，部分在器表另饰平行斜线纹；或在口沿的沿面饰一周折线纹，部分在器表另饰垂三角纹，内填平行斜线纹。钵多在口沿下饰一周宽带纹。罐多在肩部饰宽带纹、菱形网纹、菱形回字纹，或菱形回字纹与折线纹组合，部分口沿内侧或器表饰平行折线纹(下页图三，1～4)。双墩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早期前段大致为距今7300-7100年，后段大致为距今7100-6800年，晚期大致为距今6800-6500年。

侯家寨遗址位于定远县七里塘乡袁庄村，北距淮河约60公里，1985、1986年进行了两次发掘[8]。遗存可大致分为两期，第一期包括第3层、第4层，第二期包括第2层和若干遗迹单位。一期陶器种类有釜、罐、支架、钵、碗等，同时出土大量陶器刻划符号和鹿角勾形器。一期彩陶极少，仅在少量碗、罐形器上施红衣或红彩宽带纹。一期遗存属于双墩文化，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大致为距今7300-7100年。

综合以上材料，安徽地区最早的彩陶，可追溯到距今约7300年，有以下特点：(1)多为泥质红陶和灰陶；(2)器形有盆、钵和罐；(3)均为橘地红彩；(4)多为外



图二　石山孜二期文化彩陶

1、2、4.盆(T0725⑦：16、T0823⑨：46、H148：16)3.钵(H187：10)(均为石山孜遗址出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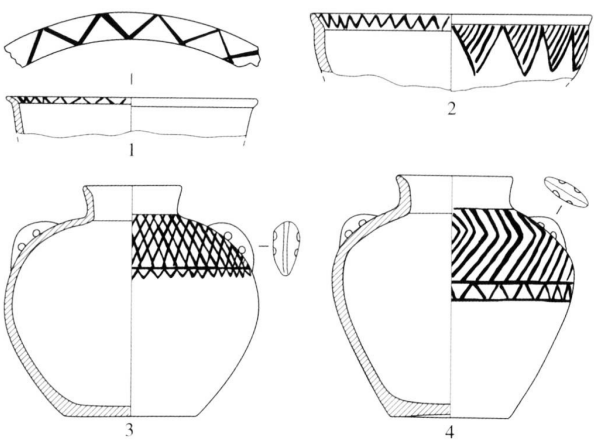
彩，有极少量内彩；(5)纹饰均为几何形线条，有交叉线纹、平行斜线纹、折线纹、垂三角纹、宽带纹、菱形网纹、菱形回字纹、交错条纹、平行条纹、三角形图案、放射状条纹等。

二、橘地红彩系的形成

距今6000年前后，淮河中游和江淮地区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变迁，主要表现为陶器中鼎形器普遍代替了釜形器，鼎、豆、罐组合流行，彩陶数量显著增加。本期彩陶主要发现于石山孜三期、侯家寨二期和古埂下层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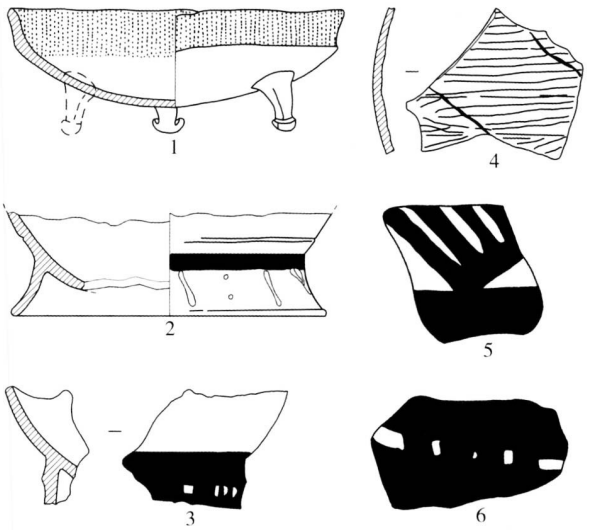
石山孜三期彩陶，多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可辨器形有三足钵、盆、碗、豆等，均为橘地红彩。三足钵器表施红衣，口沿内、外饰红彩宽带纹。盆多见器壁内、外磨光，施红衣，器内上腹部及沿面涂红彩。碗口沿内、外各饰一周宽带纹。豆座多饰宽带纹、空格状纹、宽带纹与竖条纹组合等，豆盘口沿下多饰一周宽带纹。彩陶片饰有平行斜线纹、平行条纹等(图四，1～4)。1988年石山孜遗址第一次发掘划分的第二期文化，相当于第二、三次发掘的第三期文化。该期出土少量彩陶，多为泥质红陶、橘黄陶、红褐陶和灰陶，器形有盆、钵、三足钵、豆，均橘地红彩，纹饰多为宽带纹。彩陶片饰有平行斜窄带纹、宽带纹组合或宽带纹、竖条纹组合(图四，5、6)。石山孜三期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为距今6300–5700年。

侯家寨二期文化面貌较一期有较大的变化，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器形以鼎、豆、罐、钵、壶、盂形器、甑等最为典型，一期流行的陶器刻划符号和鹿角勾形器几乎不见。二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彩陶的大量出现，器形有碗、钵、三足钵、豆、罐、器盖等，多橘地红彩。碗口沿内、外，圈足处多饰一周宽带纹；有少量内彩，口内饰一周宽带纹，内壁、内底绘有似植物和几何形花纹图案。钵口沿下饰一周宽带纹，或饰宽带纹、折线纹组合。三足钵口沿下饰一周宽带纹。豆盘口沿下饰一周宽带纹，或饰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以竖条纹作间隔；豆柄饰三周宽带纹，宽带纹之间填折线纹。豆盘口下还见有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宽带纹、间断平行波浪纹组合，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并以云纹作分割，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并以竖条纹作分割，弦纹、勾连云纹组合，平行条纹、竖条纹组合，宽带纹、菱格纹组合，条带纹、三角网纹组合等。罐口沿下多见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宽带纹、咬合锯齿纹组合，有少量宽带纹、折线纹组合，弦纹、勾连云纹组合等。见有一件橘地黑彩罐，颈部饰一周纹饰，漫漶不清。器盖捉手竹节上、下各饰一周宽带纹，盖顶为条带纹、折线纹组合，或以两周弦纹将盖顶分割成两个单元，内圈以捉手为中心饰八组三角网纹，留白处构成八角星纹，外圈饰咬合三角网纹(图五，1～11)。除上述可辨器形外，还出土大量彩陶片，均为橘地红彩，纹饰有圆



图三　双墩文化彩陶

1、2. 盆(92T0721㉖：113、92T0521⑱：61)
3、4. 罐(86T0820③：78、86T0820③：79)(均为双墩遗址出土)



图四　石山孜三期文化彩陶

1. 三足钵(M10：2)2、3. 豆柄(T1629④：5、T1730⑥：10)4～6. 彩陶片(T0724⑥：4、T3④：20、T2④：37)(均为石山孜遗址出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点纹、三角纹、三角网纹、水波纹、平行波浪纹、平行条纹、圆圈纹组合，宽带纹、勾连云纹、条带纹、三角网纹组合，条带纹、平行折线纹、方格纹组合，宽带纹、平行条纹、菱形方格纹组合，方格纹、宽带纹组合，平行条纹、平行折线纹组合，宽带纹、条带纹、折线纹组合，条带纹、菱形网格纹组合，宽带纹、“口”字形方格纹组合，平行条纹、竖条纹、云纹组合，宽带纹、竖条纹组合，连珠纹、平行条纹、云纹组合，宽带纹、平行波浪纹组合，平行宽带纹等(图五，12～19)。见有极少量内彩，其中一件为橘黄色地，饰红彩圆弧纹、放射状图案组合(图五，20)。侯家寨二期因有全新的内涵，可称为侯家寨文化。侯家寨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为距今6100-57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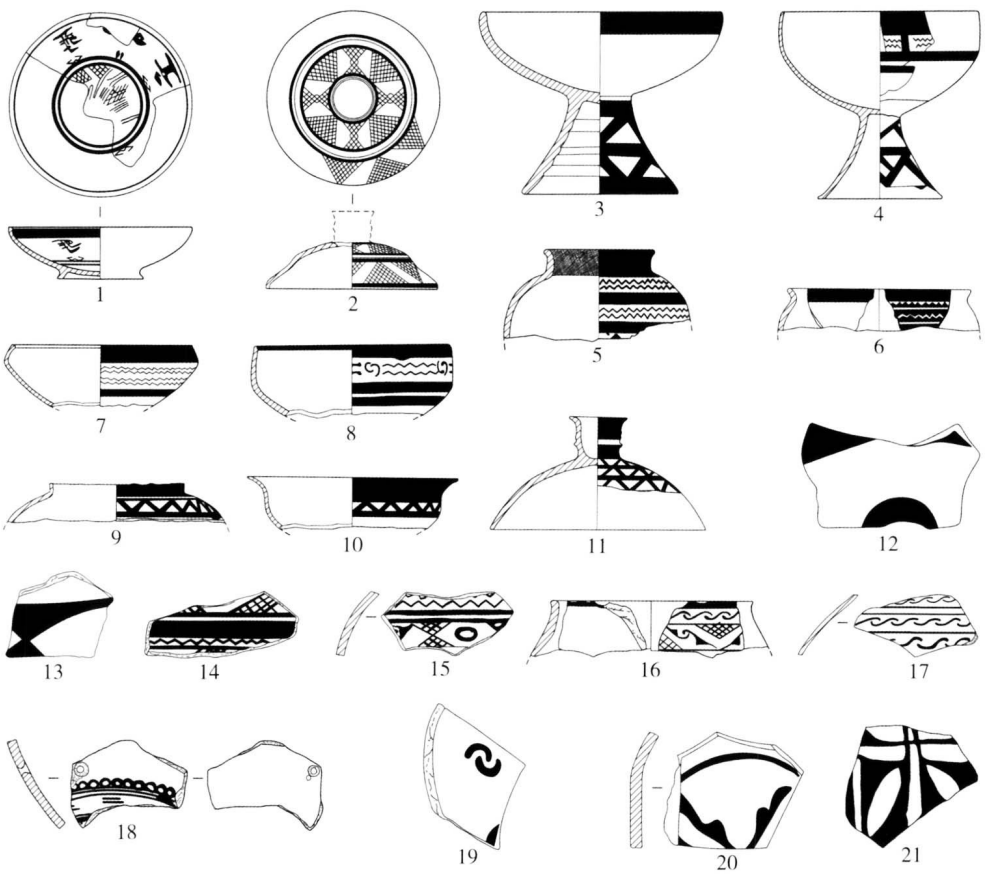
古埂遗址位于肥西县上派镇，1983年发掘[9]。早期地层发现数件彩陶片，其中一件为泥质红陶，橘黄色陶衣，饰黑彩草叶花瓣纹(图五，21)。古埂早期遗存的内涵与年代，约与侯家寨文化相当。

综合以上材料，本期彩陶有以下特点：(1)多为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2)器形有碗、钵、三足钵、豆、罐和器盖，其中三足钵和豆为新出现器形；(3)多为橘地红彩，有极少量橘地黑彩；(4)多为外彩，有极少量内彩；(5)纹饰有宽带纹、条带纹、平行线纹、竖条纹、平行斜窄带纹、折线纹、菱格网纹、波浪纹、锯齿纹、勾连云纹、圆圈纹和连珠纹等及其组合，在若干零星陶片上发现有圆点纹、三角纹和花瓣纹。

三、橘地红彩系的发展

大致距今5800-5500年间，橘地红彩系陶器在江淮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性遗存见于孙家城一期文化。与此同时，在属于凌家滩文化的韦岗遗址发现一组颇具特色的红地黑彩陶器，为江淮地区所仅见。

孙家城遗址位于怀宁县马庙镇栗岗村，北靠大



图五　侯家寨文化彩陶

1.碗(T3②：119)　2、11.器盖(T3②：117、T2②：136)　3、4、7、8.豆(T3②：131、T3H1：2、T4②：58、H3：11)
5、6、9.罐(T2②：154、T3②：78、T3②：94)10.钵(T4②：2)　12～21.彩陶片(13②：91、CT：29、T3②：14、T6②：16、T6②：5、T3F11：1、CT：23、T3②：47、CT：24、古埂H2：16)(除21外，均为侯家寨遗址出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沙河，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费屋地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三个阶段，分属孙家城一期文化、孙家城二期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早期[10]。彩陶主要出土于一期文化层，可辨器形有豆、盆、陶塑等。豆多见泥质灰黄胎、红黄胎，橘地红彩。豆盘口沿下多饰一周宽带纹，其下或饰条带纹和垂弧纹组合，或饰水波纹，或饰锯齿纹。豆柄竹节处饰条纹带，条纹带之间填平行折线纹。盆为红地黑彩，口沿及折沿处饰条带纹，条带纹之间饰平行斜线纹。彩陶猪为泥质红黄胎，橘地红彩(图六，1～5)。彩陶片多为泥质红黄胎，其中橘地红彩饰有宽带纹、平行条带纹、平行折线纹、菱格纹、叶状纹、水波纹、勾连云纹等及其组合(图六，6～8)；部分为红地橘彩，口沿饰竖条纹、条带纹、菱格纹、宽带纹、折线纹等及其组合(图六，9)；少量为白地红彩，口沿饰宽带纹、“田”字格纹组合(图六，10)。二期彩陶数量较少，其中自地红彩饰卷云纹、平行条纹组合(图六，12)，或饰“井”字形图案；少量为白地黑彩，饰宽带纹(图六，11)。孙家城一期年代相当于本地的黄鳝嘴类型或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早期，二期年代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偏晚。一、二期的绝对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为距今5800-5500年。

韦岗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大马村韦岗组东南侧，西南距凌家滩遗址墓葬区约2.7公里，2013年进行发掘[11]。出土陶器以鼎、豆、壶为基本组合。彩陶以TG2第13层出土最多，可辨器形有盆、盘、豆、罐，多为红地黑彩，剥落较为严重。盆多为泥质褐胎，饰宽带纹；或泥质红胎夹植物，见有内彩。盘、豆多为泥质褐胎，饰宽带纹。罐多为泥质灰黑胎，饰宽带纹(图七，1、4～6)。彩陶片有泥质褐胎，红地黑彩，饰宽带纹；或泥质黑胎，白地红彩，饰条带纹(图七，2、3)。除彩陶外，还出土数量较多的白陶，值得进一步关注。韦岗遗存属于凌家滩文化，比照凌家滩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大致为距今5700-5300年。

综合以上材料，本期彩陶有以下特点：(1)多为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2)器形有盆、盘、豆、罐、陶塑等，其中彩陶塑为新出现器形；(3)孙家城一期以橘地红彩为主，有少量红地黑彩、红地橘彩和白地红彩，二期出现白地黑彩；韦岗遗存多为红地黑彩，有少量白衣红彩；(4)多为外彩，有极少量内彩；(5)纹饰有宽带纹、条带纹、垂弧纹、水波纹、锯齿纹、平行折线纹、平行斜线纹、菱格纹、平行条纹、叶状纹、勾连云纹、竖条纹、“田”字格纹、卷云纹、“井”字形图案等及其组合。

图六　孙家城一、二期文化彩陶

1～3.豆(07HSG2：17、07HST3⑪彩：1、07HSG2)　4.盆(G2彩：18)　5.猪(T2⑩：22)　6～12.彩陶片(07HST3⑪彩：5、07HST3⑪彩：21、07HST3⑪彩：9、07HST2⑩、07HSG2、07HST3④：彩2、07HST3④：彩1)(均为孙家城遗址出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四、安徽地区彩陶的尾声

大致距今5500-4900年，江淮南部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和淮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有零星彩陶，面貌较为复杂，安徽彩陶逐步进入到尾声阶段。

薛家岗文化一期的彩陶，见于潜山薛家岗、宿松黄鳝嘴遗址。

薛家岗遗址位于潜山市王河镇薛家岗村，1979-2000年进行过六次发掘[12]。薛家岗文化一期出土少量彩陶，其中有一件泥质橙红陶片，上半部先施一层白陶衣，再以棕褐色颜料绘成弧形三角纹(图八，1)。薛家岗文化一期的年代与崧泽下层、北阴阳营二期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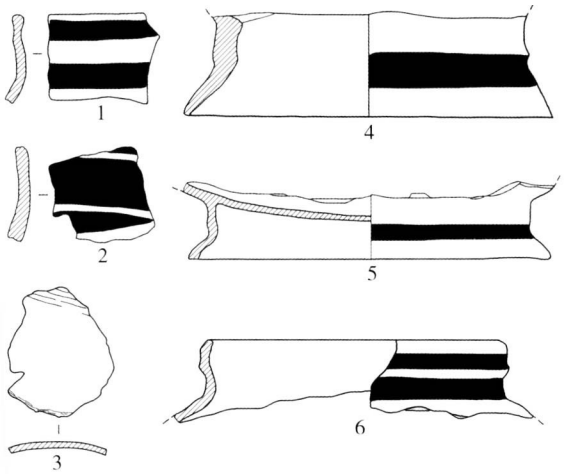
黄鳝嘴遗址位于宿松县程岭乡大塔山北，1981年试掘，1982和1984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13]。出土有少量彩陶，多在钵、豆口沿和腹部饰红彩宽带纹(图八，12)。黄鳝嘴遗存的年代与薛家岗文化一期相当，大致为距今5500年前后，但也有学者认为“黄鳝嘴文化”早于薛家岗文化。

薛家岗文化二期的彩陶，见于潜山天宁寨和安庆夫子城遗址。

天宁寨遗址位于潜山县梅城镇，南距薛家岗遗址7.5公里，1982、1984年进行了两次发掘[14]。遗址堆积分上、下两个文化层，在下文化层出土一件彩陶残豆柄和几件彩陶片。豆柄为泥质红陶，竹节处饰红彩宽带纹、条带纹，条带纹之间填平行斜线纹(图八，3)。彩陶片在红地上用橘色绘平行条带纹，或在条带纹之间再绘折线纹(图八，4)，或在橘地上绘红彩宽带纹、平行条带纹(图八，6)。天宁寨下层的年代与薛家岗文化二期相当，大致为距今5400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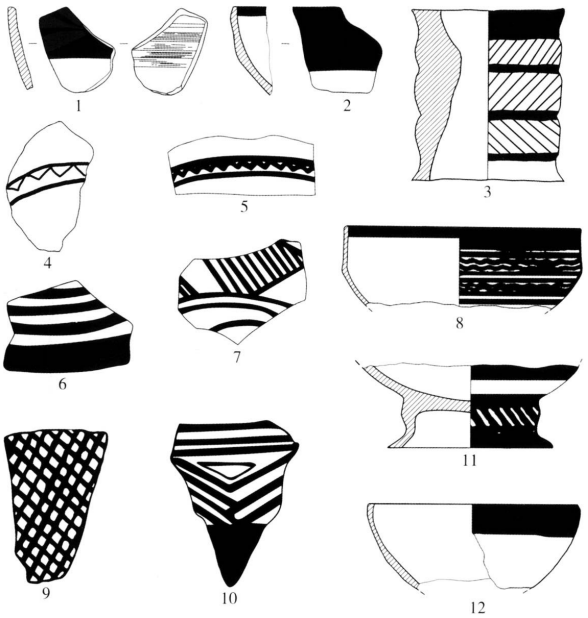
夫子城遗址位于安庆市皖河农场中联大队龙口村，北距皖河约4公里，1987年试掘，1990年进行了发掘[15]。出土彩陶多为泥质橙黄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细砂红陶，可辨器形有钵、碗、豆、罐等，以红彩为主，有少量黄彩和白彩。钵口沿内、外饰红彩宽带纹，器表饰条带纹、波浪纹组合，或器身外壁上半部涂满红彩(图八，2、8)。碗腹部饰一周红彩宽带纹，圈足饰两周宽带纹，宽带纹之间填平行斜线纹(图八，11)。豆柄饰红彩宽带纹、平行条带纹，内填平行折线纹(图八，10)。彩陶片有的内壁饰红彩菱形方格纹(图八，9)；或红地白彩，上、下各有一道条带纹，条带纹之间饰锯齿纹(图八，5)；或红地橘彩，饰平行弧线纹、平行斜线纹组合(图八，7)。夫子城遗存的年代亦与薛家岗文化二期相当。

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在其中后期已经覆盖了



图七　韦岗遗址出土彩陶

1.盆(TG2扩⑬:4-1)　2、3.彩陶片(TG2扩⑬:4-2、TG2扩⑫:12)
4.豆(TG2扩⑬:5-1)　5.盘(TG2扩⑬:5-2)
6.罐(TG2扩⑬:6-2)



图八　薛家岗文化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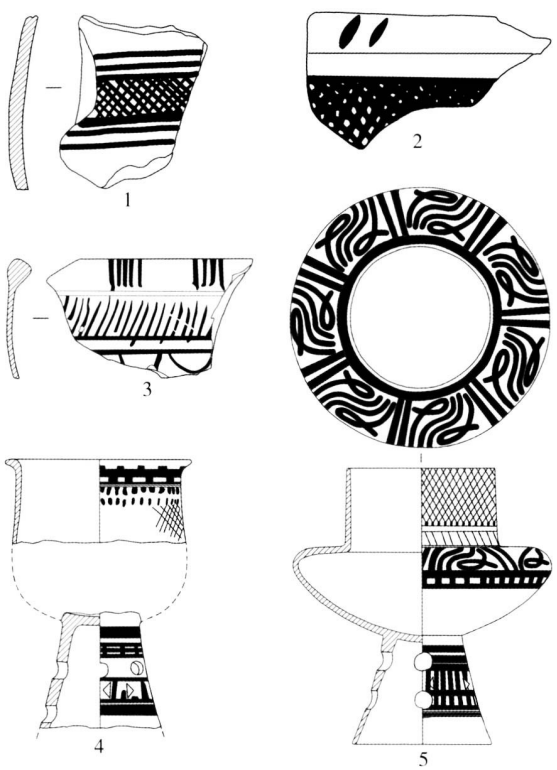
1、4～7、9.彩陶片(薛家岗T16⑤:18、天宁寨T2④:45、夫子城T4⑥:27、天宁寨T2④:47、夫子城M2:3、夫子城T4⑥:21)
2、8、12.钵(夫子城T4⑥:25、夫子城T4⑥:26、黄鳝嘴M6:13)
3、10.豆(天宁寨T2④:48、夫子城T4⑥:28)
11.碗(夫子城T4⑥:2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安徽境内淮河以北地区，但迄今为止，淮北地区极少发现典型大汶口文化彩陶，仅在宿州小山口、古台寺和萧县金寨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少量彩陶，且面貌复杂。

小山口、古台寺遗址均位于宿州曹村镇，1991年进行了试掘[16]。在两个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各出土一件彩陶片，小山口所出彩陶片为一钵形器口沿，泥质红陶，沿外饰两道叶形纹，沿下饰菱格纹，均为黑彩(图九，2)；古台寺所出彩陶片为泥质红陶，褐色彩绘，上、下饰平行条纹，中间为菱格纹(图九，1)。

金寨遗址位于宿州萧县金寨村，在2016年西区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壕沟、墓葬和大型红烧土沟等。彩陶出土于G8，有红衣黑彩、黄衣黑色泛红彩，纹饰以条带纹和网格纹为主。盆为细泥红陶，黑彩，口沿上有两组竖条纹，肩部饰条带纹、平行斜线纹和垂弧纹。杯为细泥黄陶，黄色陶衣，口沿下有两周细条纹，中间为竖点纹，腹部为菱格纹，圈足上有数周条带纹，间以竖点纹。壶为细泥黄陶，黄色陶衣，黑彩泛红，口颈部饰网格纹，颈下部饰条带纹、平行斜向点纹，肩部饰有七组变形“S”纹，其下有两周条带纹，圈足上又有六周条带纹，间以竖线纹[17](图九，3～5)。金寨遗址西区遗存的年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大致距今4900年左右，主体文化因素为大汶口文化，但彩陶壶、盆等兼具屈家岭、大河村文化等因素。



图九　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出土彩陶

1～3.彩陶片(古台寺T1③:6、小山口T1④:2、金寨G8⑥:21)
4.杯(金寨G8⑥:6)　5.壶(金寨G8⑦:30)

综合以上材料，本期薛家岗文化彩陶有以下特点：(1)多为泥质红陶、橙黄陶、黄陶、灰陶和夹细砂红陶；(2)器形有钵、豆、碗、罐；(3)仍以红彩为主，有少量白地褐彩、红地黄彩、红地白彩；(4)多为外彩，有极少量内彩；(5)纹饰除薛家岗出土一件疑似弧形三角纹外，均为宽带纹、弦纹、平行条带纹、平行斜线纹、折线纹、平行折线纹、锯齿状折线纹、波浪纹、菱形方格纹、平行弧线纹等。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出土彩陶有以下特点：(1)多为泥质红陶、泥质黄陶；(2)器形有钵、盆、杯、壶；(3)多见红衣黑彩、黄衣黑彩；(4)多为外彩；(5)纹饰有条带纹、菱格纹、垂弧纹等。

五、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由上可知，安徽地区彩陶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彩陶发生阶段，以石山孜文化和双墩文化彩陶为代表；橘地红彩系工艺形成阶段，以侯家寨文化彩陶为代表；橘地红彩系工艺发展阶段，以孙家城文化彩陶为代表；彩陶尾声阶段，以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出土彩陶为代表。

安徽彩陶分布于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周围有仰韶、庙底沟、大汶口、青莲岗、龙虬庄、北阴阳营、崧泽、大溪和屈家岭等文化环绕。因此，若要进一步认识安徽彩陶在中国史前彩陶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需对其与周围彩陶文化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一般认为，渭河流域和关中地区的老官台、白家村、大地湾文化彩陶，将中国彩陶的起源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前。有学者认为甘肃史前彩陶完整的起源与发展序列“不仅在中国其他区域没有见到，在世界其他区域也没有见到”[18]。由石山孜、双墩诸文化遗存可知，安徽彩陶发生的年代与渭河和关中地区几乎同步，目前尚无法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传播关系。

距离更近、年代更早的上山、跨湖桥文化彩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为探讨安徽彩陶的来源提供了新线索。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彩陶器形有大口盆、平底盘、罐、壶、圈足盘等，多红衣满施内、外，其上有红彩和乳白彩，纹饰有条带纹、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19]。跨湖桥文化彩陶多为橘地红彩，或红地橘彩，器形有罐、盘、豆，纹饰有条带纹、折线纹、波浪纹、环带纹、垂弧纹、太阳纹、火焰纹、十字纹、叉形纹等[20]。相比较而言，跨湖桥文化彩陶与安徽彩陶有较多的共同因素，相互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

部分学者认为，距今6000-5000年，各地的文化出现了一场大融合或兼并，以庙底沟彩陶为代表，以花瓣、勾连纹样为核心，向东影响到大汶口文化，向南影响到大溪和崧泽文化，因此可将这一时段及其文化现象称为“庙底沟时代”[21]。庙底沟彩陶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红地黑彩，二是花瓣、勾连纹样。这两个要素在安徽地区均未得到发展，不仅红地黑彩极为罕见，花瓣、勾连纹样也仅在古埂下层和薛家岗一期各发现一片疑似花瓣纹和弧线三角纹彩陶片。

尽管如此，安徽彩陶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还是可以在郑州大河村和鹿邑武庄等遗存中找到部分踪迹。大河村早期彩陶，多在钵、碗、豆等口沿下饰红色、棕色或黑色宽带纹。仰韶文化一期多见白衣和米黄衣，施黑色或棕色单彩，纹饰有带状纹、弧形三角纹、直线纹、平行直线纹、圆点纹、勾叶纹、弧线纹等。二期多为白衣彩陶，彩绘多用黑色，纹饰有带状纹、弧边三角纹、直线纹、圆点纹、网纹、平行直线纹、曲线纹、鱼纹。三期彩陶最为丰富，白衣彩陶最多，多黑、红或棕、红两彩兼施，单彩较少，纹饰有平行直线纹、平行曲线纹、弧线纹、直边三角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圆点圆圈纹、同心圆纹、锯齿纹、六角星纹、网纹、菱形纹等。四期白衣彩陶基本消失，仅有少数红衣彩陶，多饰单一的黑彩或红彩，彩陶已明显地衰退，纹饰有直线纹、平行直线纹、圆点纹、圆圈纹、同心圆纹、三角纹、曲线纹、锯齿纹、网纹、垂弧纹、水波纹、折线纹等[22]。大河村彩陶中的折线纹、垂弧纹、锯齿纹、菱形网纹等，与侯家寨、孙家城等遗址所出近同。

武庄一期彩陶少见，二期彩陶较多，以红彩为主，有少量褐彩及黑彩，施白衣和红衣，纹饰以宽带纹、窄带纹最多，锯齿纹、菱形“田”字纹、波折纹、圆点弧线三角纹、弧线三角勾云纹也较常见[23]。武庄遗存中的宽带纹、平行宽带纹、平行条纹、锯齿纹、宽带纹与折线纹组合等与侯家寨、孙家城等遗址所出相同。

部分学者认为安徽彩陶受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影响较深，关系也更为密切。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彩陶颜色以白、黑、红三种为主，黄彩最少，在纹样图案的色彩组合上出现了两种和两种以上颜色的复彩。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网纹、斜栅纹等数量增多，其他图案包括弦带、网纹、水波纹等。在颜料的种类上，黑彩最多，仍以复彩为主。栾丰实将大汶口文化彩陶纹样图案分甲、乙两组，甲组主要由圆点、勾叶、弧边三角、花叶等纹样母题组合而成，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乙组如弦带(弦纹)、垂弧、折线纹等，为本土文化特征[24]。大汶口文化甲组纹饰在安徽地区基本不见，乙组纹饰中的宽带纹、垂弧纹、折线纹、波浪纹、网纹等应与安徽地区存在某种交流。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白彩的较多使用，一是涂白色陶衣，然后在白地上绘黑彩或红彩；二是把白色与其他颜色搭配使用，构成两层甚至三层的复彩[25]。安徽地区仅在孙家城、韦岗、薛家岗、夫子城等遗址发现有少量白彩使用，三层复彩基本不见。

不少学者认为淮河中下游以及江淮中、东部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关系较为紧密，如张敏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进行了反思，并重新建构了一个由若干“考古学文化系统”组成的新体系，其中青莲岗文化系统的空间范畴包括海岱、江淮、宁镇和太湖流域这一广袤地区[26]。但就彩陶而言，淮河下游和江淮东部地区的青莲岗、龙虬庄诸文化中发现有较多的内彩和黑彩，显然与安徽彩陶不是同一个系统。

青莲岗遗址出土彩陶多为内彩，口沿内、外各有一道红彩宽带纹，内壁上绘有弧线纹、水波纹、八卦纹等，其他还有网纹、双弧线与斜方格混合纹、斜十字纹、带形纹等[27]。近年新发现的黄岗遗址，距青莲岗遗址仅20公里，二期地层中出土有丰富的彩陶，可辨器形有钵、匜等，多为内彩，以黑彩为主，有少量橘地红彩，纹饰有舞蹈人像、太阳纹、双弧线纹、八卦纹、水波纹、网纹、平行条纹等，整体风格与青莲岗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28]。万北遗址二期文化出土彩陶以黑彩为主，皆为内彩，纹样主要有变形鱼纹、三角网纹、栅栏纹、宽带纹、水波纹、双弧线纹等，亦应属青莲岗彩陶系[29]。

龙虬庄文化彩陶主要发现于第二期，有红彩和黑彩两种，以黑彩为主，且多内彩，外彩仅见钵、碗口沿下或圈足上所饰宽带纹。纹样以宽带纹、斜方格网纹为主，其他还有网纹、水波纹、栅栏纹、圆圈纹、几何纹、卦形纹、脚印纹、由弧线三角形组成的花瓣纹以及变形鱼纹或鸟纹[30]。龙虬庄的变形人面鱼纹、万北的变形鱼纹明显受关中仰韶文化的影响，在安徽地区均未发现。

多数学者认为江淮地区的侯家寨、薛家岗文化与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关系密切。北阴阳营二期出土彩陶多红衣黑彩、红衣褐彩和白衣红彩，器形有鼎、盉、碗、钵、盆等。鼎、盉、碗的彩绘多施于器外壁，盆、钵的彩绘多施于内壁[31]。北阴阳营文化流行的红衣黑彩和内彩，与安徽彩陶有着显见的差异。

朔知认为安徽皖江两岸全域在崧泽时代表现出明显的崧泽化趋势[32]。崧泽遗址中层发现有较多彩陶，可辨器形有罐、壶、豆、杯等，有的整器涂抹一层红褐彩；有的从口沿至底足，以红褐彩绘数道宽带纹；有的在器肩以红褐彩绘连圈纹，中间兼施淡黄彩[33]。崧泽遗址还发现有一件白衣黑彩圆点弧线三角纹，应受庙底沟彩陶的影响[34]。崧泽文化彩陶的器形与纹饰，也与安徽彩陶有不少的差别。

至于两湖地区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彩陶，可能与安徽彩陶有一定的联系，但在具体的纹样上，除宽带纹外，大多并不互见[35]。唯金寨出土彩陶壶，与京山屈家岭所出者相同，为认识屈家岭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由上可知，尽管始终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化交流，以红地黑彩和花瓣纹为标志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以白衣、黑彩和复彩为标志的大汶口文化彩陶，以及以内彩和黑彩为主要特征的淮河下游、江淮东部和宁镇地区彩陶，与安徽彩陶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似可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在中国史前彩陶的历史进程中，安徽的淮河流域和江淮之间存在有一支以橘地红彩工艺为主要特征的彩陶文化。

第二，从时间上看，安徽彩陶在大致距今7300–4900年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序列相对完整。

第三，从空间上看，安徽彩陶的发展似有重心逐渐南移的进程，即由淮河以北经由江淮之间最后到达长江沿岸。

第四，从文化源流上分析，所谓庙底沟时代的彩陶浪潮，包括大汶口文化甲组纹饰，基本没有波及；周围其他如青莲岗、龙虬庄、北阴阳营、崧泽、大溪和屈家岭诸文化彩陶，与安徽彩陶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有限；相较而言，跨湖桥文化彩陶，丰富了我们以往对安徽彩陶来源的认知。

第五，安徽彩陶在中国史前彩陶及其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是一项值得继续关注的课题。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还可以对安徽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做出一点新的思考。尽管周围的大汶口文化在中期以后基本覆盖到淮河以北地区，崧泽文化也有着向北(江淮东部)、向西(宁镇皖南地区)扩张的历史进程，但基于以下考虑，安徽的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仍可能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双墩文化刻划符号系统在多地重复出现并具有明确的边界，且双墩文化与侯家寨文化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距今6000年前后，本地区出现一次较大的文化变迁，彩陶数量显著增加，橘地红彩系工艺传统最终在侯家寨、孙家城等地形成；孙家城文化与薛家岗文化也有着明确的地层叠压和文化继承关系；距今5500年前后，本地区出现了以凌家滩为代表的中心聚落、高等级墓葬以及杰出的玉石器工艺，其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性不容低估；距今5300年前后，本地区又出现一次文化变迁，亦即所谓“玉石分野”[36]，更加说明了凌家滩与薛家岗文化的内在联系。因此，安徽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系统，由双墩、侯家寨、孙家城、凌家滩和薛家岗等文化所构成，这个文化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最终为本地区先秦时期的淮夷文化奠定了明确的空间范畴和广泛的物质基础。

附记：安徽大学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张小雷、南京博物院甘恢元、蚌埠市博物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汪全武先生为资料收集提供了便利，课题组成员姚倩星、许丹阳、李筝、肖航承担了部分资料校对和线图清绘工作，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a.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见《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

b.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见《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

[2]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原始文化初探》，见《文物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88年.

[3]严文明：《安徽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的初步观察》，见《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

[4]邹厚本、谷建祥：《青莲岗文化再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5]朔知：《安徽新石器时代绘彩陶器》，《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

[6]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3期.

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濉溪石山孜——石山孜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定远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1期.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1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孙家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5期.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局：《安徽含山县韦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3期.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鳝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夫子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2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2期.

[1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县博物馆：《安徽萧县金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区2016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0年第3期.

[18]王仁湘：《中国彩陶文化起源新论》，《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

[19]蒋乐平：《义乌桥头遗址》，《人民日报》2020年1月5日第8版.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第55～60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1]a.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b.李新伟：《“彩陶中国”的重新思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鹿邑县武庄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3期.

[24]栾丰实：《海岱地区彩陶艺术初探》，见《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25]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考古》2010年第4期.

[26]张敏：《青莲岗文化的回顾与反思——兼论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文化区的相互关系》，见《东方考古》第8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27]a.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县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b.吴山菁：《略论青莲岗文化》，《文物》1973年第6期.

[28]林留根等：《江苏淮安黄岗遗址2018-2019年发掘收获》，见《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

[29]南京博物院：《江苏沭阳万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30]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3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32]朔知：《崧泽时代皖江两岸的聚落与文化》，《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33]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32～8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3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35]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36]朔知：《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以五地墓葬材料为例》，见《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